

1963年,郭沫若为马衡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作序时,高度评价马衡先生的学术贡献,指出:“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考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就是有力共睹的。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北大造就了马衡,马衡也为北大考古学立下了开创之功。

初任北大:从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到金石学讲师

马衡1917年8月移居北京,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后兼任马木教员。

国史编纂处于1917年归并到北大后,附设于中国史学门。其下分为纂辑、征集两股,纂辑股兼纂辑历代通史及民国史,征集股掌管征集关于史之一切材料。通史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等类)两种;辞典分为人名、地名、职官、器物、方言等类。民国史亦先编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志及列传四类。

编纂处处长由蔡元培直接兼任,纂辑股主任由文科科长陈独秀兼任,纂辑员由文科教员张相文、叶瀚、刘师培、沈兼士、周作人兼任,特别纂辑员有屠寄、邓之诚、张星娘等。征集股主任由陈相忠担任,而马衡是唯一的征集员。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到1919年春,国史编纂处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教育部为此发出指令,称该处纂辑、征集两部分事项“成绩斐然,至堪嘉许”。其中史料征集方面,从1917年8月到1919年1月31日,东、西各种书报及抄录之件780余种,约5560余册。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凝聚着马衡先生的心血和贡献。在此基础上,国史编纂处又成立史学讲演会,设通史、学术史、法制史、宗教史等各组,马衡主持考古学组(金石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4日-25日)

与此同时,马衡也积极参与北大校内其他活动。1917年12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成立,马衡受蔡元培委托担任导师,并为书法研究会成立作《论汉碑书体》一文。同时,他借传授书法技艺之际,开列收购大批碑帖拓本,为金石学的研究传承准备了丰富的教学资料。《书法研究社报告》:“本社自去年冬成立后,迭与校长及马叔平先生商一切力求进行,至今略有头绪。”(《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2日)在2月25日书法社举行的第一次演讲大会上,马衡又作了演讲《隶书之源流及变迁》。

他开列的第一项购买碑帖是“周《石鼓文》”,经过几年的深入钻研后,1922年4月,他撰写完成《石鼓为秦刻石考》,于1923年1月发表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1号。

马衡征集图书、史料的工作以及学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1919年12月,马衡首次被北京大学评议会聘为图书委员会委员。1920年,马衡又任北京大学讲师,开始在历史学系正式讲授《金石学》。经过三年的征集员工作,马衡终于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从职员转变为教师,开始登上了最高学府的讲坛。

2023年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年”,学校希望通过更高质量的开放办学,加强与世界交流,不断提升北大的国际化办学能力和全球声誉。回望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北大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批东西方知名学者来北大访问与讲学。他们有的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体现出北大广泛吸收中西思想的眼界与襟怀,也反映出学校影响力的提升。1920年8月31日北大授予法国前总理班乐为(卫)(当时《北京大学日刊》翻译为“班乐为”,其他报纸报道翻译为“班乐卫”,现也译为“潘勒韦”,本文统一为“班乐卫”)理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北大也是我国第一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次名誉博士授予的经过,相关档案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

一、《北京大学日刊》中的相关记载
班乐卫是著名数学家,曾任法国国务总理。他在我国辛亥革命后力倡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积极倡导两国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并于1920年促成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成立,他自己担任院长。1920年6月22日至9月11日,班乐卫率领由法国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访问团来中国访问,当时他其中一份身份即是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6月29日至7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对班乐卫的到来进行了连续3天的报道。7月1日,班乐卫参观北京

校史钩沉

马衡与北京大学

——北大校史文献档案中的马衡先生

·杨琥



1920年代任历史学系教授时的马衡



1924年9月,研究所国史同仁在北大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第三排左三为马衡)

讲授金石学,搜集、调查古物:北大考古学的开创者

如前所述,1920年,马衡任北京大学讲师,开始在历史学系讲授《金石学》。经过两年多的讲授,马衡于1922年8月,升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3年,马衡又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考古学学会开会干事,《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12日。在马衡主持下,考古学学会着手计划古物调查、发掘和保存等事项。其调查范围大致分为古物、古器物、古美术品三类,调查方法大致有五种,即记录、绘图、照相、造型、摹拓。

1922年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成立后,在国史学门正式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考古学机构。该研究室聘请马衡担任主任,后又陆续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王国维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

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之初,曾经“将本校所藏之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陈列于一室,以为考古学研究室之预备”,但由于经费有限,成立一年后,未能充分开展活动,也很难进行考古学研究。因此,“本学门一年来,关于考古学方面著力较多,而成绩却不甚佳。中国之考古学向无系统,古物之为用,仅供古董家之玩玩而已。我们现在虽然确已逃出这个传统的恶习范围之外,知道用科学方法去研究,但为财力所限,未能做到自行发掘,实地考证的地步。研究室所用材料,均由市俗辗转购得,器物之出土地点及其相互关联之关系,均不易知,故进步甚难。”(《魏建功〈研究所国史学门恳请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10日)为此,1923年夏,国史学门在考古学研究室下又设立“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任会长。该学会的宗旨是“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与遗物”(《古迹古物调查会章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第553页),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考古学团体。该会成立后,计划先自调查入手,一俟经费充裕,再组团发掘。(《研究所国史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6月21日)

学林记事

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陈香

大学,蔡元培在北大二院大讲学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班乐卫作了长篇演讲。《北京大学日刊》7月1日还专门开辟一栏,介绍班乐卫履历和学术成就。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礼于1920年8月31日在北大第二院举行。1920年9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到第四版“本校新闻”的一篇《本校授予学位礼纪事》进行了详细报道,整个仪式议程如下:(1)首由校长蔡先生致开会辞,(2)次由教务长顾先生(顾孟余)述授学位人班乐卫之履历,(3)次由校长蔡先生正式授与班氏以学位,(4)其次班乐卫氏致答辞,(5)其次奏中法国歌,在会者一律起立致敬,(6)奏乐毕,蔡校长致毕会词。蔡元培校长的开会辞如下:

今日为本校第一次授与名誉学位之期,承中外来宾惠然临会,至为荣幸。本校教务会议决,现在应授与名誉学位者为班乐卫、芮恩施、儒班、杜威四位先生。但芮恩施先生已经离京。杜威现在

1924年5月19日,古迹古物调查会开会,决定改称为“考古学会”。该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正式以“考古学”命名的学术团体。创始会员为马衡、沈兼士、叶瀚、李宗侗、徐旭生、容庚、董作宾、李石曾、陈垣、陈万里、傅孟衡、铎尔孟,共十二位,由马衡任学会主席(《研究所国史学门考古学学会开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6月12日)。在国史学门,马衡代表考古学学会进行的几次考察所得古物,不仅保存于古物陈列室,而且对其展开研究,一些暂时难以得出结论者,向王国维等国史学门通信导师请教、讨论。

除此之外,马衡主持考古学会后,亦与国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展开交流合作。1925年春,美国哈佛大学组织旅行团到敦煌考古。北大国史学门在福开森的介绍下,经沈兼士、马衡二人筹划,选派考古学会的陈万里与美国考古队同往调查。这次实地调查历时几年,获得不少资料(陈万里《西行日记》,国史学门1926年出版,收入《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同年10月,受日本学者滨田耕作与原田淑人之邀,马衡赴朝鲜参观汉乐朗郡古冢之发掘及出土古物情况,回国后发表《参观朝鲜古物报告》。1926年6月,在马衡、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倡议下,经各方协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作组建东方考古学协会。同月30日,于北大第二院召开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之后,1927年3月,马衡与沈兼士、罗庸赴日参加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总会及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并参观室博物馆、东洋学文库等学术机构。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演讲《中国之青铜时代》,后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月刊》1927年1卷6号。该文提出商周二代为中国青铜时代的论断,此论被随后的殷墟等考古发掘所证明。

马衡与考古学会从事的这些工作,尽管属于开创,但其意义重大。这些活动及其工作,尤其是考古资料的搜集与积累,为以后北大考古学专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0年,班乐卫(前排左三)到北访问

在北戴河,须于本校开学后来京。儒班先生去年曾到本校参观一次,不知何时再来。惟班乐卫先生正在北京。今日之会,实专为班乐卫先生而设。儒班先生与班乐卫先生有同国关系,而且班乐卫先生愿为代表,所以亦于今日举行授与仪式。至芮恩施与杜威两位先生,当俟杜威先生回京后在定期举行(1920年10

12日;《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物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12日)1924年8月,马衡又到洛阳北邙山调查出土文物,为学校购得一些车器,并发现了两千年的布。(马衡《洛阳访古日记》,《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月报》)1925年7月至8月初,再赴洛阳考察,为北大购得汉魏石经参石数十种。马衡代表考古学学会进行的几次考察所得古物,不仅保存于古物陈列室,而且对其展开研究,一些暂时难以得出结论者,向王国维等国史学门通信导师请教、讨论。

此外,马衡主持考古学会后,亦与国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展开交流合作。1925年春,美国哈佛大学组织旅行团到敦煌考古。北大国史学门在福开森的介绍下,经沈兼士、马衡二人筹划,选派考古学会的陈万里与美国考古队同往调查。这次实地调查历时几年,获得不少资料(陈万里《西行日记》,国史学门1926年出版,收入《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同年10月,受日本学者滨田耕作与原田淑人之邀,马衡赴朝鲜参观汉乐朗郡古冢之发掘及出土古物情况,回国后发表《参观朝鲜古物报告》。1926年6月,在马衡、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人倡议下,经各方协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作组建东方考古学协会。同月30日,于北大第二院召开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之后,1927年3月,马衡与沈兼士、罗庸赴日参加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总会及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并参观室博物馆、东洋学文库等学术机构。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演讲《中国之青铜时代》,后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月刊》1927年1卷6号。该文提出商周二代为中国青铜时代的论断,此论被随后的殷墟等考古发掘所证明。

马衡与考古学会从事的这些工作,尽管属于开创,但其意义重大。这些活动及其工作,尤其是考古资料的搜集与积累,为以后北大考古学专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书斋考古到田野考古:走向近代考古学

作为一位金石学专家,马衡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以传统的金石学领域为限,而是在实践中认识到近代考古学的价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马衡至河南洛阳及安阳诸处调查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村民和私人偶然的发现或挖掘,是一种挖宝行为,实际上破坏了文物所保存的环境,使人们无法认识古物真正的价值,更不可能有助于古物研究和历史研究。他指出:“自来我国古器物之出土,类皆民间偶然发现,随时随地残毁消灭。”因此,他明确提出开展有计划发掘工作的主张:“窃以为古物既偶然发现,当于发现之地,集合专家,作有计划之发掘。虽破铜烂铁、残砖、断壁,亦必记其方位,纤细靡遗。如此,则一、地点不致谬误,可籍以知为古代之某时某地;二、器物之种类、数量、方位不致混淆,可以明各器物之关系即其时之风俗制度;三、建筑物不致有破坏,可以观其时之工艺美术;凡此种种,胥于学术上有所贡献。其价值视寻常无意识之发现,为何如耶!”(《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此后,他大力倡导科学的考古发掘,号召重要古迹应当由学术界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1926年1月,在《京报副刊》发表《考古与迷信》,对当时社会上将田野发掘等同于盗墓掘坟,并视为破坏风水行为的迷信思想与风气进行了批评,指出国内缺乏考古事业,提倡田野考古发掘。1927年,马衡开始积极筹备洛阳汉晋大学故址和安阳殷墟发掘,但由于政局变动,北大被改组为京师大学校的变故,其事被迫中止。

1928年,马衡致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提议组织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并推荐自己的学生、时任北大考古学会事务员的董作宾参与发掘,中央研究院遂于1928年先北大而前往殷墟发掘。(傅振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考古学会之贡献》,《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2期)

马衡与国史学门同人之所以积极发展考古学,也是由于不甘于在考古学领域中落后于外人,因此,当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来华组织探险队欲往新疆、甘肃等地进行探险考察活动的消息传出后,国史学门同人群情激昂。为了阻止外国人自行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及带走古生物标本,从事“学术的侵略”,马衡积极联络和发动北京学术界同人,一起抵制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史学门召集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呼吁政府禁止外国人到西北进行考古活动。会议议决:由到会各团体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筹划发掘采集

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人中国采集诸事宜。马衡与沈兼士、刘半农等人代表北大研究所国史学门出席会议。同月10日,斯文·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拜访,表示愿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由沈兼士、马衡、徐炳昶接见。19日,召开第三次联席会议,决议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更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呈报教育部立案。4月17日,召开第八次会议,由主席推定徐炳昶、马衡、刘半农三人起草中瑞双方合作办法。后经双方协商交涉,最终达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十九条,并于4月26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史学门举行签字仪式。根据协议书而成立的西北考察团,团员改为中外学者各半,由身兼北大教务长和国史学门导师的徐祖生担任考察团的中方团长。马衡尽管没有参加考察团,但他无疑为维护中方权利、促成中外合作组成考察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政局动荡,北大被拆解和重组,马衡虽然未能参加和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但他却主持了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5公里许的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1929年,马衡代表北大、北平研究院与时任河北教育厅厅长的沈尹默相商,决定以河北作为北大的考古发掘基地。其首选发掘地即为燕下都遗址。11月底,马衡偕傅振伦、常惠至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调查,回来后作《燕下都城垣遗址》说明。1930年3月初,马衡主持召开北大考古学会干事会,讨论燕下都遗址发掘问题。一周后,又于团城主持召开会议,由北大考古学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研究院合组燕下都考古团,马衡任团长。4月7日,马衡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演讲《燕下都考古调查及发掘计划》。4月22日,马衡率考古团全体成员由北海团城乘车出发,当晚抵达易县,驻于城东南十八里的练台村。27日,在燕下都城北郊的老姆台上举行开工典礼,易县县政府以下各机关均有代表参加。次日,正式对老姆台遗址进行发掘。

6月,因遭孙殿英威胁报复及易县当地地痞骚扰破坏,马衡被迫停止燕下都考古发掘工作,在友人的协助下离开北平,经由天津乘船回南方避难,并由胡适亲自护送至上海。

尽管有此干扰,但燕下都老姆台遗址发掘,获得文物201袋及36木箱。发掘工作结束后,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傅振伦的《燕下都考古记》,常惠的《易县燕下都故址调查报告》(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等。

燕下都遗址发掘,虽然只进行了一个多月时间,但收获和意义重大。此次考古,不仅使世人得以了解和认识燕下都,还为日后燕下都遗址的保护和全面发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与殷墟考古发掘一样,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对马衡本人来说,也是他从书斋中的金石考证向近代田野考古发掘意义上的探索性的关键一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衡完成了从金石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作者为北大校史馆副研究员)

位即需“按章办事”,从档案馆馆藏评议会记录看,1920年7月8日特别会议决议的事项中涉及赠与名誉学位事宜。具体记录如下:“赠名誉教授或名誉学位于外国著名学者。议决:凡著名学者,经教务会议推荐,评议会通过,得由本校赠与名誉学位或名誉教授或两者并赠。其详章另议定之。全体通过。”“此处议赠与名誉学位由教务会推荐,评议会议决,与《北京大学日刊》中所提到的由教务会议议决稍有不同。

三、继任为新
诚如蔡元培校长所说:“所以我为本校第一次授与学位属于班乐卫先生,不但是北京大学至重要之纪念,实可为我国教育界之大纪念。”实际上这次典礼还是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提及班乐卫当时的一个身份是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该学院是中国在海外办学、研究和传播汉语文化的有益探索,当时赴巴黎大学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入读该学院。

坚持开放办学,服务“国之大者”是北大光荣的历史传统。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是学校推动改革发展、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动力。新时代,北大将继续引领卓越,一往无前,以全球塑造力构筑美好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档案馆助理研究员)